

洪武帝

明帝列传

孙文良 著



明 帝 列 传

洪 武 帝

孙文良 著

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明帝列传

洪武帝

孙文良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桂兰 吕海江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5 插页 350 千字
(长春市新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10 260 册 定价：21.50 元
ISBN 7-80626-043-9/K·37



作者简介

孙文良(1933—1995),著名的明清史专家。辽宁省灯塔县人。1954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,1956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,先后从师于著名历史学家赵光贤、白寿彝教授,专攻明清史。1959年毕业于,调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,后晋升教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历任系主任、校教务长、清史研究所所长,兼任辽宁史学会会长、中国史学会理事等。著有《明清史人物》、《中国古代官制史》(台湾),合著《清太宗全传》、《明清战争史略》、《乾隆传》,主编《满族大辞典》,参编《中国史稿》、《中国通史》等10余部著作,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论文80余篇。1995年4月,完成《洪武帝传》稿后不久,不幸因病逝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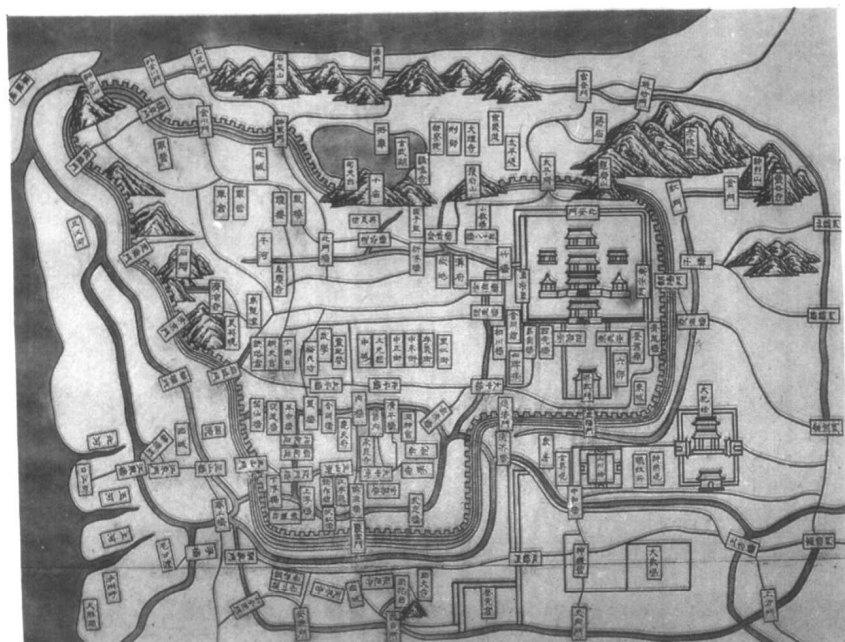
洪武帝朱元璋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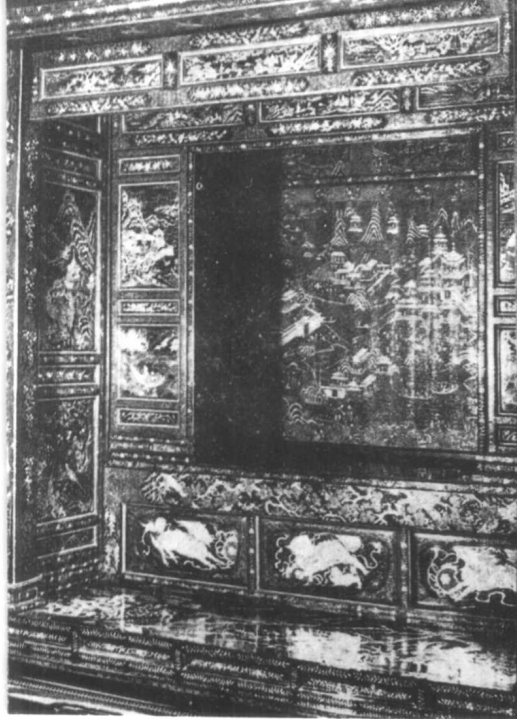
马皇后像

洪武帝朱元璋手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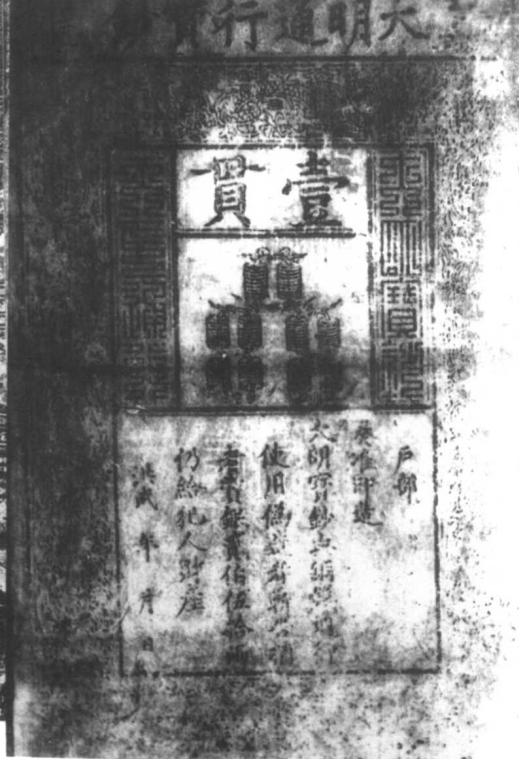
諸侯國公湯和奏到日即便
 將軍士水隻回京候時已是
 過期不必候海客去裏海原
 年如自月歲加行備此諸如
 信國云未火都塘孫松四姓
 亦行即便收歸軍中



明洪武南京城圖



洪武帝朱元璋的睡床



洪武年大明通行宝钞

南京明孝陵



前 言

洪武帝，朱元璋，一个传奇式的历史人物，元末明初社会大动荡时代的弄潮儿。在他生活的半个多世纪里，从一贫如洗变成富有天下；从默默无闻的微贱小民到一跃成为赫赫大明天子，实在值得探讨，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。

认识洪武帝这样的历史人物，首先就应该知道他的这一最大特点：他不是既定的皇位继承人，完全是个人奋斗来的一代大明帝国创造者。他本来是大元帝国的臣民，而且大元曾有过辉煌的时期，其空前统一，打开中西交通，各民族经济、文化发展等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只是到了末年，一切矛盾总爆发，才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将其彻底埋葬的这个人物降临到了江淮一户贫民之家了。

洪武帝生于元天历元年（1328），乳名重八，大名兴宗，又改元龍，字国瑞。他的先世曾住江苏沛县，几次迁徙，无有定居，至朱元璋诞生时已流落到濠州钟离（今安徽凤阳东）。他生来体弱多病，家里极端贫穷，出于对未来的憧憬，为他出生前后编了许多神乎其神的佳话。如说他出生后，家里夜间总有火光。或说，他小时候有病，欲将其许给庙上，恰巧僧人不在，抱了回来。可是后来不是有人说他家“有一龙”，就是说将来会荣华富贵（《天潢玉牒》）。各种说法无非是给其未来加

上个神圣的光圈。

可是无情的现实使那个神圣的光圈黯淡了，一是眼前的生活悲惨之极；二是朱元璋不靠幻想，而是奋起搏斗。朱元璋出生时的元朝末年，国是日非，从皇帝到诸王大臣，只顾争权夺势，搜刮钱财，醉生梦死，昏昏噩噩。朱元璋的家，同广大人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，在死亡线上挣扎。按元朝的规定，他的家原来当过淘金户，本地不产金，要到别的地方买了金子交纳，因此越发贫困。后来迁到安徽几个地方从事农业，仍然摆脱不了厄运。朱元璋来到世上，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家徒四壁，一无所有。他的童年为人放过牛，进了校门，虽很聪明，却没有钱读下去。最悲惨的是17岁那年，遇上了天旱和瘟疫，1个月内，父、母、长兄被夺去了性命。家里穷得没有一块墓地为3位亲人葬身。惨还惨在船破偏遇顶头风，他自己孤苦伶仃，投奔皇觉寺为僧，到寺上没过两个月，因年饥岁荒，寺主封仓，又被迫到外地云游乞食去了。自东往西，由南到北，到过安徽、河南的庐、六、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。路上“朝望突烟而急进，暮投古寺以趋踰。仰穷崖崔嵬而倚碧，听猿啼夜月而凄凉。”（《御制皇陵碑》）岁月蹉跎，过了3年的乞讨生活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，想要立志向学，却处在农民大起义的前夜了。转机来到眼前，朱元璋做了慎重选择。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四月，黄河连年决口，危害了元朝的漕运和盐场之利，诏开黄河故道，共280里。白莲教首领韩山童、刘福通利用这次治河的民夫聚会和不满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。

他们以红巾为号，称红巾军或红军，得到各地人民广泛响应，锐不可当。官军奉命镇压，屡战屡败，起义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，“赤帜蔽野而盈岗”。时人把元朝的腐败和农民起

义有关的几件事编出歌谣称：“堂堂大元，奸佞专权，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巾万千。官法滥，刑法重，黎民怨。人吃人，钞买钞，何曾见！贼作官，官作贼，混贤愚，哀哉可怜。”（《南村辍耕录·醉太平小令》）大起义的第二年，定远人郭子兴起义，攻占了濠州，官军随之前来镇压，起义军在城里，官军驻城外。起义军免不了对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行破坏，奇怪的是官军公然杀良民冒功领赏。25岁的朱元璋面对身边两种势力的逼近，必须作出选择了。先是起义军中有人劝他参加，曾犹豫不决，等官军来了又使他大失所望。站在十字路口上，想到向寺上的伽蓝问卜，卜了3次，问逃、问守皆不吉，只有参加起义最吉。这是朱元璋一生中极关键的一次选择，是否最后由问卜决定，当然可以研究。即使如此，也不过说明他经过反复思索，慎之又慎。问卜之后，即投身起义，参加了濠州的郭子兴部的红巾军。

机遇和才能结合造就的是光辉前程。他在郭子兴部下表现出色，得到信任，很快由亲兵升为九夫长、镇抚，总军事。意外的收获是，郭子兴见朱元璋才能出众，决定把义女马氏嫁给了他。从此他不但得到了一位贤内助，而且使他的地位变得特殊了。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二月，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，号小明王，建都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，国号大宋，建元龙凤，成为联络和领导各支起义军的中心。朱元璋被授为左副元帅，他接受了龙凤年号。同年，郭子兴因与部将孙德崖等矛盾，悒悒而卒，朱元璋即代领这一支起义军，所谓“滁阳一旅”，奠定了未来大业的基础（《明史·郭子兴传》）。龙凤二年（1356），渡江，攻克元在南方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重心集庆（今南京市），而后称吴国公，并以此为根据地，征伐四方。他英明的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，一方面在南方打着龙凤旗号坚

持反元；另一方面凭借北方韩林儿、刘福通所率起义军同元朝作战的机会，消灭反元大起义崛起的群雄，主要是优居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和富甲一方的平江（苏州）张士诚。《明史》对此有个较为公正的说法：“元之末季，群雄蜂起。子兴据有濠州，地偏势弱。然有明基业，实肇于滁阳一旅。子兴之封王祀庙，食报久长，良有以也。林儿横据中原，纵兵蹂躏，蔽遮江、淮十有余年。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，借其力焉。帝王之兴，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，夫岂偶然哉。”（《明史·刘福通、韩林儿传赞》）

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，朱元璋周围有徐达、常遇春、胡大海等猛将云集；又有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等群贤毕至。朱元璋注意发挥他们每个人的优长，但又总是显得他个人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徐达自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就戒之“毋焚掠杀戮”，常遇春虽“摧锋陷阵、未尝败北”，但朱元璋时时提醒他“克城无多杀”（《明史·徐达、常遇春传》）。胡大海领兵在前线作战，儿子在京犯酒禁，有人怕大海不满，阻止处罚。朱元璋却说：“宁使大海叛我，不可使我法不行”，亲手斩之（《明史·胡大海传》）。为削平群雄，刘基建议先攻陈友谅，再灭张士诚，被采纳；但对待龙凤政权的关系，朱元璋一直不顾刘基的反对，既奉其年号，又与之保持联系，终于有效地利用了其强盛一时的巨大力量。

正确评价登极为帝，创建大明国的意义。朱元璋在军事上依靠“滁阳一旅”，攻打天下，在政治上假龙凤政权之号，由元帅而平章，而丞相，自己则从吴国公（1356）到吴王（1364），逐步当上了皇帝。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，但是有积极意义。龙凤十一年（1366）小明王死后，改元吴元年（1367）。就在本年，平定张士诚，然后命徐达、常遇春率师 25 万由淮

入河，北伐中原。第二年（1368）正月四日，元朝尚未灭亡之前，朱元璋于应天（南京）之南郊祀天地，即皇帝位，建国号明，建元洪武。过去的农民军统帅朱元璋成了名符其实的洪武帝，一代大明宣告诞生。同年闰七月，元顺帝离开大都（北京）逃走，元朝灭亡，明军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。又经过20年，统一了全国。《明史》毫不夸张地描绘了洪武帝创建的大明帝国，称：“明太祖奋起淮右，首定金陵，西克湖、湘，东兼吴、会。然后遣将北伐，并山东，收河南，进取幽、燕，分军四出，芟除秦、晋，讫于岑表。最后削平巴、蜀，收复滇南。禹迹所奄，尽入版图，近古以来，所未有也。”（《明史·地理志》）

农民起义领袖当皇帝是反封建革命的一种结局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六月的一天，与群臣讨论礼乐之兴否，洪武帝说：“朕居位已三十年矣，礼乐之文粗备，而政治不能为古，揆德凉薄故也。”侍臣当场为其统治的30年进程及其成就作了这样一个概括：“陛下武定祸乱，文致太平，天下翕然同风，咸蒙至化。所谓十年平之，十年富之，十年和之，真有奇效矣。而圣德谦冲，不有其有，此其跨越于前代也。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239）这段评论基本反映了历史实际，所差的是过于简略，或把平定祸乱与求富、求和孤立起来了。如第1个10年主要是扫除元朝的反动腐朽势力，削平群雄和镇压新的反抗。但是从洪武元年到十年，作为大明帝国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一段，除其以上主要任务外，还建立了各种制度，如沿元制设中书省，置左、右丞相，以为政府中枢。又置御史台，设左、右都御史，掌监察。先置枢密院，后改大都督府，掌军旅，其设官屡经变化。其法制、军制，以及选拔人才的科举，培养人才的学校等都在这个时期相应地建立起来了。这就是洪

武帝所说的“立纲陈纪”（《明史纪事本末·北伐中原》）。同时，采取“休养生息”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。

明朝建立后的第2个10年，确乎为了改善经济状况，下了很大力气，尤其是初期和其后不断实行的奖励垦荒，减免租赋，徙民屯田，兴修水利，便商轻税等积极措施不断地产生出了效果。《明史》上说这时“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，少者亩以千计，多者至二十余万。”（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），据统计，洪武十三年，全国新垦土地共增加了180余万顷。土地开垦，粮食充足，后来下令各地设粮仓，谕天下有司凡遇岁饥，则先发仓廩以贷民，然后奏闻。”（《国朝》卷10）可谓“富之”了。然而经济之外的重大措施，这时候采取的也不少，如“胡党之狱”，就是洪武十三年兴起的一件政治大案，不但该事件本身延续十几年，还影响到政治制度上的一系列大变化。从此废掉中书省，不设丞相，提高六部职权，又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。可以说洪武帝对元朝典章制度的改革，至此才进到一个重要时期。因为洪武帝越来越强调他是一代大明朝的开国之君，即不但要推翻一个朝代的统治，还要为新的朝代创造一套不同以往的制度，让后来的子孙万代相传。为此，当军事进攻还没有停止的时候，就已经着手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了。他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中，经常提到的一个念头，就是他过去的贫困生活和参加起义的经历，反映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。

洪武帝的一生，总的来说一直都活得很不轻松。当皇帝之前，整天为贫穷困扰，东奔西跑，舍生忘死，追求从他降生的时候就盼望实现的大事业。登极之后，真的当上了皇帝，立刻就为另一种富贵所累的时候开始了。他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不分昼夜，忙于处理政事，更多的精力要放在考虑和决定长治久

安上。应该说，经过他的努力，到洪武二十年以后，和平的时期来到了，比起以前的大动干戈，相对安静多了。北元逃到了遥远的塞外草原，或打或和，基本上是明朝掌握了主动权。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，租税剥削虽没有从根本上取消，可是遇有水旱等天灾，有时能够减免，甚至还能发放粮食钱钞进行救济，原来经常被天灾人祸逼上梁山的人民反抗，大为减少。贪官污吏，受到了严惩，一般地也知道有所警惕。洪武二十年焚锦衣卫刑具，诏罢锦衣卫狱（《明史·职官志》），严刑不用了。科举、荐举等多种形式选拔人才；尤其是在中央设国子学，地方设府州县学，大兴教化，以达到“无地而不设之学，无人而不纳之教，庠序音，重规叠矩，无间于下邑荒徼，山陬海涯。”（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）说这些是平时期的景象，不无道理。而洪武帝一个空前的举动更增添了和平的氛围。这就是，洪武二十七年八月，秋高气爽，五谷丰登，作为当了将近30年皇帝的他，要与民同乐。下令在南京城搭起15座大酒楼，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。二十三日那天，他本人在醉仙楼开怀畅饮，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应该把洪武帝走过的道路看作是成功的。无论是和以前的历代皇帝比较，还是对后世影响而言，他开创的事业都应予以充分肯定。明朝当代人总愿意把他和汉高祖刘邦相比，但是说他比刘邦的成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成化、弘治年间的学者谢铎说洪武帝有超过前代帝王之功者，共5件事：“攘克夷狄，收复诸夏也；肇基南服，统一天下也；威加胜国，锋刃不交也；躬至创业，临御最久也；申明祖训，家法最严也。”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称汉高祖之功胜过汤武，洪武帝之功胜过舜禹；“夫汉高之功，一世功也；高帝（洪武帝）之功，万世功也。”明末陈于陛更为具体的指出：“太祖（洪武帝）虽得天下

易于汉高，而经理太平之业，几百倍有三焉：其一，高祖不数年而卒，太祖三十年，纤悉具备，无以加矣；其二，汉高虽承秦火，大抵因袭秦敝，太祖扫胡元而复帝王之制；其三，高祖犹有诸臣，太祖无辅相，自圣心神画者独多也。”（《国榷》卷11）本朝的人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他们的评论或许夸大其词，有歌功颂德的成分，但基本事实没有失真，谈得符合实际，还可以找到反证，中国历史上常常是后代否定前代，但代替明朝的大清却很奇怪，不仅清太祖、太宗大量采用明朝的制度。最突出的是顺治帝，超乎寻常的对洪武帝备加赞扬。顺治十年（1653）正月的一天，他向满汉大学士范文程、额色黑、宁完我、陈名夏提问：“自汉高以下，明代以前，何帝为优？”大家回答：“汉高、文帝、光武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明洪武，俱属贤君。”又问：“此数君者，又孰优？”陈名夏说：“唐太宗似过之。”顺治却说：“岂独唐太宗！朕以为历代贤君，莫如洪武。何也？数君德政有善者，有未尽善者。至洪武所定章程，规划周详。朕所以谓历代之君，不及洪武也。”范文程等当场表示赞同（《清世祖实录》卷71）。顺治帝对洪武帝这种推举绝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即反映了洪武帝本身是所有著名君主中其成就无与伦比，同时，清朝也在很大程度中继承了由洪武帝一手创建的规章制度。

至此，又要说到另一个方面，就是洪武帝还有不足和遗憾。在他参加农民起义军不久，曾向李善长询问：“天下何时定？”李善长没有说明多长时间，只提醒汉高祖“五载而成帝业”，要他“法其所为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按照他的说法，完成帝业就算天下安定了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洪武帝登极，天下没有安定，他当了皇帝之后，经过一二十年也没有完全安定。洪武帝的危机感那么强烈，绝不是徒然的，社会的确存在着不安定

因素。不仅有“南倭”与“北虏”的威胁与侵扰，还有内地与边疆的人民反抗，都使他不能高枕无忧。他严厉惩治贪官污吏，因此甚至遭到当代和后世普遍批评，想了许多办法让后来者知所警惕，可是金钱的诱惑，始终不能阻止一些人铤而走险。洪武帝为此大伤脑筋。他还觉得开国以来的文臣武将不可靠，大开杀戒，兴胡党之狱、蓝党之狱，前后沿续 10 余年，元功宿将被牵连而杀者共 3 万余人，并把自己的 20 多个儿子封为亲王，让他们手握重兵，镇守要害，出乎他的预料竟埋下了诸王争夺皇权的祸根。洪武帝早年的贫苦经历，影响他在当皇帝之后，确实曾想使所有的人不再像他过去那样在苦海里挣扎，但直到晚年仍找不到摆脱穷困的良丹妙药。他解释不了这一切的社会根源，而我们可以说清了，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必然结果。当生产力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水平，私有制继续存在，剥削压迫仍在作怪，所谓和平，廉政，共富等理想，只能是幻想。更何况洪武帝本身实质上也没有那种纯正的理想了。

悼念文良老师

——致读者

著名的明清史专家、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与世长辞了。

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洪武帝》，是他的一系列明清史著作中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一部心血之作。

1995年1月8日，他刚写完本书的最后一页——《后记》，未及喘口气，就对全部书稿再加工润色。适值春节到了，只有正月初一这一天，他同全家共享节日的欢乐，而从初二开始，他抛开家人，不舍昼夜，兼程而作。家里人都知道他的脾气，不敢劝阻他，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轻轻地招呼一声。文良先生连续工作到正月十四，全部书稿通改一遍，最后杀青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太累了！”接着，他就病倒了。在医院二个多月，日夜抢救，终因身罹绝症，医治无效，不幸于4月25日19时38分溘然长逝。终年只有62岁，而这部《洪武帝》竟成了他的绝笔。

文良先生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明清史专家。还在50年代中期，他就学于名师赵光贤、白寿彝先生的门下。赵、白两先生都是国内有数的老一代历史学家。文良先生得其真传，于先秦史、明清史典籍皆称娴熟，钩沉史籍，游刃自裕；学术底蕴雄